

■新作聚焦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重返初心

□张燕玲

长久以来，王跃文成了中国文坛“官场小说”的代名词，“官场”小说似乎是王跃文的看家本领，从《国画》到《大清相国》再到《苍黄》，笔下的人物日夜在政治的刀光剑影中厮杀，在现实生活的尖锐变里浮沉，在权谋的虚实深潭内挣扎。他的小说素来好看，粉丝广大。其实，这种持久文学吸引力并不仅仅来源于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更来源于王跃文书写人性的穿透力：有深度的人物、风生水起的故事、扎实尖锐的细节、虚实俊逸的文思……与其说王跃文是对政治生活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人性的书写以及官场里变异的人性的批判。只有把人性内核打开，挖掘到那片或柔软或坚硬的旷野，才能达到王跃文作品入木三分的情境及其直抵人心和世界本质的笔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单从“官场小说”上解读王跃文有隔靴搔痒之嫌。

所幸，王跃文时隔5年推出新作《爱历元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解读他文学创作的新文本。新著几乎褪尽“官场小说”的外衣，一反过往的官场的疯狂，以平静款款的笔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诚挚的情爱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人到中年的王跃文把笔触指向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以一夫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之路来观照近30年来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大变迁，挖掘人性的异想、暗流与幽微、真实与谎言、挣扎与涅槃、理解与包容，相生相应揭示了爱是家庭核心，人类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

主人公孙离是县高中的语文老师，他以前才情征服了美丽同事喜子。沐浴着玫瑰色的光影，珍惜着身边的姑娘，孙离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与热情，带着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的勇气，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爱情日历，把彼此心意相许的那年设为“爱历元年”。然而，

生活态度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在两个人逐渐渗透的生活中发酵成无法弥合的裂缝，牵着手在漫长的河堤上走向婚姻，争吵却代替甜蜜的嬉闹，成为生活的主题。

喜子努力考取了上海的研究室，想要逃离小县城的不堪，孙离则在家带孩子孙亦赤，与世无争，只想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两脉情感轨迹渐行渐远，喜子博士毕业了苍市师范大学工作，举家迁居苍市。命运改变，两人重逢，却已初心不在，爱历元年也成为了陈年往事，生活只剩下烦躁与默然，爱意远去，暗潮汹涌。

孙离成为了畅销推理小说家，沉迷于兰花般的报社社长李樵，图书馆馆长喜子爱上年轻有为之手下谢湘安，与天下的出轨家庭一样，夫妻双双隐瞒着彼此的不忠，在各自热烈的艳遇中沦陷，细细体味从没在夫妻间有过的另番柔软，只有在某些时刻，“爱历元年”成为心中突然闪现的念想，两人才会回忆起曾经对彼此如此炽热的承诺。“这些年来，他们谁也没有再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迷失，难以回到初心，绝望地希望。有关中年危机的悲观绝望，却在作家“理解之同情”的笔致下，人性自然地生长盛开中，渐次走向暖意和希望。苍市前的日常生活，王跃文写得细致灵动、真切动人，他给点点滴滴生活的皱纹撒下细细碎碎的“面包屑”。从第13节到第32节，夫妻彼此情感各自沉沦，使生活偏离了初心；此后，他们顺着王跃文笔下的“面包屑”，终于找到重返初心的回归之路。这是孙离喜子的情感成长史，他们一步步建立在王跃文对日常生活精雕细刻的描述之上。希望于绝望，绝望于希望。

永远就像最初相爱的那一天，是天下所有恋人的梦想，但生活的茂密曲折让永葆初

心成为缥缈的海市蜃楼，惟此，人们才前仆后继，上下求索；惟此，爱情生活才成为文学永远的母题。

在王跃文笔下，他选择让这种愿景在九死一生后实现。这种生活的实现，不仅在于孙离和喜子在孩子问题上最终以弥合：侄儿山子寄宿家中，让两人缺失的共同育儿的经历实现；得知亲生子错抛乌龙，却因此为亲生儿子郭立凡换取成功；叛逆养子孙亦赤经过旅途也终于珍视家庭。他们对平凡生活的回归，还在于周遭人生：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与尼姑妙觉看破红尘的大情怀，邻居小英被儿子江陀子无意拆迁致死的惨烈中，感知到世事的无常和平凡生活的可贵。李樵专注于工作，谢湘安回到父母期望的熊芸身旁，孙离爸爸的彻悟，弟弟孙却大病后的淡泊……

在小说中，王跃文为笔下人物在生活与精神困境、时代与社会变迁中找到了精神的出路，那就是与人为善，回归日常，重返初心。尤其寄托作者情怀的是主人公孙离，这个人物身上有《苍黄》中李济沅的良知甚至失眠，却多了李济沅没有的淳朴自然与散淡。面对家庭危机与情感的困境，他的出走之后回归、背叛之后救赎，在王跃文笔下有了新的向善和升华，也使之有了《苍黄》《大清相国》《国画》多了些人间烟火和人性暖意。惟此，我们得以再次抚摸到王跃文心中那不灭的人生态度与人文情怀，再次感受到王跃文艺术功力的坚实和创作境界的再度升华。

大雪之中，孙离和喜子依偎着，回到“爱历元年”，王跃文也生动地完成了一个重返初心的故事。无疑，描述日常生活、寻求大时代精神危机出路，《爱历元年》对2014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颇具创造意义，因为文学史应该是一部精神史，而精神史必须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上。

■创作谈

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出版了。我很得意于“爱历元年”这个书名，这是我的原创。这个书名，既是小说的一个情节，也是我对书中人物的美好祝愿。

《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早些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意义还没有敞亮显现。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

可是，这部小说写下来，骨架搭建在一对寻常夫妻的情爱生活轨迹上，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越往后写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延续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我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生活的规律，也严格遵循了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也不是为了媚俗，而是我在生活中切切实实感受和思考到的，只有忏悔、宽恕、付出爱，人类才有希望。人可以自我救赎，可以给于爱，可以高擎着宽恕和爱的明灯走得更远。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他一旦深入到女主角人物的内心，就不得不去救赎她。

我也思考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本无新意。孙离爱李樵，爱得很简单，在这份感情上他并没有负罪感，也没有自律，他对李樵的爱并非自觉的放手。有读者批评我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的灵犀反省和痛苦挣扎，我觉得是过高估计了当代人的道德自律。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不属于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时时在怀疑、思辨和挣扎，当然他更不是阿廖沙，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坏人。但孙离内心有一种本能的向善的力量，他还能爱，有不忍，有正义感。就让他活在那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吧。那是一种就要亮起来却又融合着阴影的

愿人间爱历永远

□王跃文

光线。我有意在李樵与孙离的分手写得突兀决绝，不作交代。生活中有太多秘密，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些秘密是无言的，我们就让它保留着吧。

喜子和谢湘安的情感也会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谢湘安不可能爱上一个比他年长那么多的女性。在一个物欲横流、把女性当成消费品消费的时代，年轻美貌的女性才有消费价值。但喜子和谢湘安之间的情感不是互相消费。他们互为镜子，他们发现对方的美好与温暖，又在对方身上印证了自己的美好与温暖，所以他们把彼此照亮了。这是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理由。喜子最终选择分手，是因为她比孙离更善良、更愿意为他人考虑。

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拒绝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习惯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比如写出扎实而丰满的细节，它让我们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时间不那么空洞而无意义。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那一句小时浮现的笑容，通过小说的书写，这些都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仔细想想，我的那些受读者喜爱的小说都是从生活细处写起的。也许写好日常生活状态的生活，正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而日常叙事也是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

但是，仅仅这样就够了吗？肯定不够。《爱历元年》同样是一部寻问之书、追寻之书。我愿意通过这部小说，唤起读者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作家，时刻反省着自己的平庸。我很羡慕别的作家提笔就是家国天下，动辄就是宏图长卷。我写不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只好写日常生活。写日常生活，未必就不是文学。《爱历元年》也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我们仓促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迷宮，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现在，到了应该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这部小说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草蛇灰线地勾勒了些许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

写完这部小说，我的内心很明亮。我也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生活的明亮和温暖。我希望我写出了几个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得救。

■新作快评 曹文轩短篇小说《第五只轮子》《人民文学》2014年第6期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

□ 殷舒

曹文轩短篇小说《第五只轮子》中“玩轮子”的隐喻，在表面的游戏性律动中蕴含着深邃而又具有强烈孤独感意味、与文字篇幅内，曹文轩以对儿童世界的深情笔墨，完成了对一个意志力坚定、生命力顽强的个体（磨子）刻画，体现出关乎生存、关乎游戏人生、关乎生命价值等重大的形象思考。

这是一个外表亮丽、内心沉重的故事，它有点童话色彩，但又现实得不能不令人唏嘘。磨子来自人贩子遗弃这样的线索，让他的身世背后有许多故事可资联想，却无一不是沉重的、愤怒的、无奈的。他天外飞来客般地出现在青羊村人面前，却可悲地邂逅了一个前程无望的酒鬼吴庆，这让磨子的未来人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颠簸飘忽。小说的悬念也由此展开。

孩童世界的主要特征大抵表现在游戏上，这是天性使然，但就在这一简单纯粹的孩童天地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到与成人世界相似的规则与规律。其实，《第五只轮子》以及更多儿童小说的经典性也正在于此。磨子的到来，打破了青羊村儿童世界以往的格局与惯性，因此，他不断地被孩子们所不容、排挤和丢弃。游戏中因多他一人而没法分组，上学又因少一个他的课桌而只能用砖泥将就，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是“多余人”、“边缘人”为何的孩子，就这样“被多余”了，“被边缘”了。

此外，更刺激磨子尊严的是貌似“摘掉”他“多余人”帽子的两次游戏：他被允许参加了，但参加的结果却是被以一种更公开和明确的“搁置”方式——彻底让他沦为“多余人”。“瞎子”被遗弃在河边这一节令人垂泪，它并非是小伙伴的本性恶毒，但却异常残酷和具有伤害力。作为一个孤独的“多余人”，作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生命参照与交流对象的磨子，“瞎子”的隐喻已经达到一种极致。这一打击让磨子羞愤难当，只能将怒火发泄在养父酒鬼吴庆身上。

然而，读者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突然意识到了磨子的成长。他不再依赖这种乞讨式的介入和参与，他独立了、坚强了，他开始尝试思考。但成长与思考都将注定与沉重和痛苦为伴，读者与小说中的磨子一样感到沉重。不过，磨子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戏方式：玩轮子。

对孤独者磨子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相遇，他找到了与这个世界相证明的方式，就如一个漂泊的浪子终于寻到自己的根。所以，“玩轮子”外光的幽默掩盖不住它深处的严肃与庄严，尤其在这样的游戏最后，磨子可以解救他人的困境，这让他的独自游戏瞬间发光，也让他成为这个世界、这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磨子在这个世界上价值也因此得以体现。轮子，它旋转起来了，当这种转动在帮助别人动起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新的韵律。

《第五只轮子》以寓言式的口语、白描为主，在简洁的语句中体现出作者深刻的思考结晶，韵味浓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坚强、热爱生活的力量，也能让成年读者深刻反思关于这个世界更广泛的话题、更深刻的生命思索。曹文轩用这个貌似描写游戏节奏的故事，写出了人对自我生命节奏的寻找和掌控。小说中处处凉意袭来，掩卷后却暖意融融。

现代归乡文学有着成熟的自身传统，归乡叙事、归乡模式、归乡情结、归乡话语，在新文学传统中自成一脉。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离乡缘由不同，看到的世界相异，归乡的道路也各有因果。姜贻斌的长篇小说《火鲤鱼》作为归乡文学的新作，不仅继承了五四以来鲁迅等人开创的乡土中国观察视角，而且融汇了沈从文自然乌托邦的审美理想。

五四以来，离乡者众矣。这种生活状态投射在写作中，就成为归乡文学的精神源头。《火鲤鱼》提供了归乡文学的新视野。小说对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乡村世界的凋敝、价值观念的变迁有更多正面思考。同时，作者的重心还是放在寻找之上。作为乡村外来者，沿着心灵寻根的漫漫长路，纵向追踪童年玩伴各自的人生轨迹、横向展开社会生活斑斓画面。作者追问的是生活的本质，寻找的是幸福的源头。

小说以中年还乡为主线，写时隔数十年兄弟几人重返故乡的见闻。沿着童年生活过的湘中乡村所见所感和往事回忆，描写了渔鼓庙几十年的变迁，作者试图通过文化寻根揭示乡村世界的种种缺陷；同时通过心灵寻根的潜在叙事动机，揭开乡村人生的种种密码。小说打破了时空、记忆与现实的区隔，在生与死、爱与恨中饱含同情与悲悯。

重回渔鼓庙，“我”已是寻找故园的异乡人了，少年伙伴大都风流云散。“我”不仅关注他们的现状，反复追问，而且对当年的旧情遗憾怅惘、深怀忏悔。对车把这样的抛妻弃子之人颇为不满。这里面颇有朦胧素朴的爱，也有现实与爱情的冲突，当年，父亲因为满妹是乡下女子而反对两家结亲，而二哥因为出身不好，失去了两情相悦的小彩。及至中年重逢，曾经的美好情愫演变成“我”对满妹的渴望，二哥与小彩夫妇的隔阂，比起找回曾经的故乡有着更深的悲哀。故乡面目全非是外在

范晓波的首部长篇小说《出走》以“出走——回归——出走”为架构，围绕主人公张蒙和祺琪的职场历练和情爱游移展开。张蒙为了实现自我，从小城来到都市，为了寻找自我，又从都市回归小城，最终为了摆脱迷失的自我，再次离开小城。祺琪从厌倦都市风月到沉湎小城情爱，又因世俗纷扰逃离小城。男女主人公一个是追求自我的斗士，一个是崇尚爱情的天使，但终究冲破不破红尘，挣脱不脱宿命。

作家通过两位主人公从最初的向往、勇敢的实践到途中的迷茫和最后的淡然，为我们展示了追求的历程。正如作者所述：“社会如此纷繁莫测，人生如此无常可循，我不一定能告诉你幸福的确切住址，但我一定会祝你幸福。”生活就像电影，既然无法预测结局，就应该安然享受和创造现实。不奢望、不失望是最平衡的状态，也是范晓波笔下男女主人公“出走——回归——出走”情节的最好诠释。

以散文见长的范晓波内心始终萦绕一种独有的浪漫情调。《出走》的主题关乎事业、爱情和浪漫意义，事业的追求需要信念的支撑，爱情的坚持需要情感的固守，而生命意义本身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命题。在物欲膨胀的当下，以名利定成功到底算不算狭隘呢？作者对成功的思索源于自己曾经的记者身份。在作者看来，成功既难以述说又难以复制。当初的出走为张蒙带来了名和利，也带来了其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考量。本身的浪漫气质为张蒙的回归提供了内部动力，而直接接触发其回归的除了与祺琪的爱情，还有在与竞争对手李家梁的较量中不断加深的对现代职

■评论

《火鲤鱼》：乡土叙事的多重视角

□张艳梅

的荒芜，只要心中有美好的图画，还可以实现世界重建；而当主体内心丧失了自我指认的能力和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种隔绝比起一条小路的消失、一条河流的干枯，更难以恢复和重建。在姜贻斌笔下，人心的变动、世事的变迁、乡村的凋萎，给这个繁华热闹的时代带来冷峻幽暗的色调。小说没有刻意放大普通人的苦难与悲痛，也没有刻意批判底层社会自发的欲望和暴力，只是诚恳地把历史与现实乡村社会经历的疼痛和裂变，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之思中慢慢呈现出来。

小说《火鲤鱼》既体现了怀旧的诗学，又以回溯过去重建现在的理性之思，阐明了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立场。小说中多次提到记忆，对有些模糊的记忆心存不甘和质疑，而有些记忆烙印却又唤起内心伤感和痛苦。《火鲤鱼》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很大，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写到新世纪。小说中反复强调2001年5月2日，这是主人公回乡之日，作者以此给出历史定位，在一个恒定的点上回看历史，强化了真实感和在场景中。小说中苦恋的故事最终成为兄弟三人的记忆绝响。那些同时间里有很深的自省自问：水仙和银仙的渺渺不知所终，与其说是一种浪漫想象，莫如说是追求生命超越的渴求。二哥和小彩的悲剧既是个人的爱情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小说以二十四节气贯穿，隐含着对乡村民间文化传统的体认。那种周而复始的轮回

意味多少有些伤感，却又暗暗地强调天道自然。换个角度看，无论是回忆的心理学式阐发，还是现象学还原的回忆，都涉及到主体自身对过往经历的评价和现实处境的判断，只有找到自身所处的历史和生活坐标，才能够有效地对抗时代和生活的分裂，找回世界本真，在哲学意义上，重建生存的文化价值。

新文学传统中，除了对乡村社会以现实眼光批判和关切之外，还有一种牧歌情调。新世纪以来，各种社会问题突显，经济发展带来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和情感世界愈发贫瘠。如何打破物欲和贫困的双重围困？火鲤鱼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道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药方，作为一种象征物，近乎于沈从文所言之供奉理想人性的希腊神庙，一个朝向彼岸世界的期望和信仰。

姜贻斌内心有爱，又不会过于耽溺。故乡的风景里有现实景观，人到中年回到故乡，满眼都是物是人非，人们都去了外面的世界，渔鼓庙杂草丛生，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光秃秃的雷公山，消失了的沙洲，黑色的泥浆等都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故乡》。其次，有记忆中的原画复现。对故乡四时之景的彩绘里，有着对生命的独特感怀。另外，小说中还用大量笔墨写遥远的想象之景。自然景观是回忆的依托，是记忆的支点，同时也是主人公去意彷徨、继续无根的漂泊路上那长长的影子。

此外，《火鲤鱼》中，兄弟们不遗余力地回

物质时代的精神还乡

——评范晓波的长篇小说《出走》 □李洪华 费飞

火的壮美到回归后激情燃尽的落寞，祺琪用再次出走完成了自己对爱情的独特诠释。

“出走”是主人公不断拷问自我的结果，他们面对名利不随波逐流，通过不断的“出走”来调适自我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出走——回归——出走”的叙事架构为《出走》营造了两种极具特色的场景。范晓波以张蒙和祺琪的出走、回归和再次出为线索，通过都市与小城两种场景的转换和对比，展现了江南水乡的清新鲜俗和现代都市的复杂多变。

工业文明的喧嚣和嘈杂，商场的焦躁和无情，不仅与张蒙内心固有的诗性气质相背离，而且成功地营造出快节奏和高频率的现代都市生活。小说中，韩主任说：“如果你老感到没事可干，那么办公室马上就会没有你的位置。”老曲说：“在企业，被工作像饿狼一样不停追赶的状态，才是正常而有希望的状态”王铮因为劳累过度患病毒性脑炎也不愿给自己多放一天假。与真正融入都市节奏的白领相比，张蒙的徘徊和犹疑显得尤为可贵，他及时聆听到了内心的呼唤，心系“油菜地的葵花摇曳的家园”，在被现代都市的繁荣彻底同化前选择全身而退，这一人物的行动也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

在鄱阳湖畔度过如歌岁月的范晓波，其

忆当年的沙洲，互相补充、修改、争论，记忆不断饱满起来，而现实则越发让人失望。这种残酷的对比，不在于对现实荒芜的批判反思，也不在于对心灵往昔的回望和眷恋，而是那种对于人生的永恒的微笑、悲凉的感伤。这种对记忆的强化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方式，一种身份寻找和精神确认。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的一切居然都成了海市蜃楼，我们究竟从哪里来，那些曾经的风景朝哪里去了？姜贻斌写出了原汁原味的湖南乡村世界，写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底层百姓的人生状态，出走、寻找、回归，再离去，这一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横截面，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

小说还写出了心灵家园的爱与疼痛。姜贻斌对复杂的时代情绪内心了然。他的写作，对这个飞速发展时代给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关注世界外形，也关注心灵内部；既专注于现实的疼痛，又遥望理想的彼岸。乐伢子患肝癌死了，雪妹子死了，苦宝失踪了，三国失明了，伞把离婚后疯了，小彩的女儿被人误杀了，对于这些不幸，作者有悲悯也有寂寞，苦宝作为孤独者的典型，独自承受寂寞悲伤和羞辱；妻子和妹妹相继出走的三国同样是一个孤独者，也独自承受着寂寞、悲伤和羞辱。这两个孤独者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家园，在个体存在意义上，他们是世界的弃儿，而在三国平和的容器里，却有着对苦难的超越。

故乡是遥远的现实家园，也是切近的心灵家园。归乡文学的形成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对归乡的思索则是以文学审美的方式重建故乡，这种文化意义上的重建，近乎于宗教式的信仰。归乡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和破坏，而是自我省思之路的伸展，对故乡的热爱是对世界本源的信仰，对于火鲤鱼的向往将引领我们不断超越自身和时代的局限，寻找真正的幸福所在。

笔下人物自然少不了江南水乡的纯净和自然。故乡既是张蒙“出走”的起点，也是“回归”的必然。在张蒙的眼中，本来归属于大自然的芭蕉也被现代都市的贵气和颓靡同化，再也不见本真的自然气息。与植物一样，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人也都迷失在金钱和物质之中，张蒙眼中的都市是褪去了华彩的黑暗古堡，再灵动的思维也会因为铜臭丧失跳跃的能力，再本真的性情也会因为名利失去追求的勇气。在归乡途中，熟悉的家乡味道让张蒙的内心升腾起温热的感动，给他日后勇敢地接受爱情、坚定寻找人生意义埋下了伏笔。作家浪漫的乡间描写是《出走》诗化气质的重要体现，也为整部作品中小城故事的舒缓节奏作出了必要的铺垫。乡情是张蒙职场鏖战时全身而退的精神家园，也是划分《出走》不同叙事节奏的情感主线，两种场景的转变中，都市故事节奏的紧张、小城故事节奏的舒缓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故乡的眷恋和追求是人类最本真的情感，有骨气、有思想的灵魂应该与乡土密切联系。乡情让主人公张蒙的人生出现起伏，也令他的爱情经历了现实的拷问，所以，张蒙的两次出走都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与勇敢有关的生活：田野是理想，爱情是追求，故乡是人生。

《出走》既是一部与浪漫爱情相关的小说，更是一部描写现代都市文明的作品。作者对题材的处理方式尤其值得肯定，作者在描写都市职场生活之中融入了诗化笔调和心理思辨，在展示外部生存状况和剖析内在灵魂挣扎的同时，融入了小城的自由和烂漫，展示出谁能可贵的人文关怀。